# “要有光”：非常时期的抒情诗人

## ——关于“抗疫诗潮”的思虑或提醒

□霍俊明

说不出的快乐浮现在它们那
人类的面孔上。这些似鸟
而不是鸟的生物，浑身漆黑
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籽

似无望解脱的精灵
盲目，凶残，被意志引导

心术（油画） 于超越 陈 向 作

以上诗句出自西川当年的代表作《夕光中的蝙蝠》，这只漆黑、怪异、丑陋、恐怖、盲目、凶残、不祥的“蝙蝠”再一次倒挂在人们面前。西川诗中的“蝙蝠”让我想到了画家戈雅的《产生妖怪的理性之梦》。人类的诸多疾病往往与动物有关，“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总会有不祥和恐惧时刻的到来，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

诗歌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的是有效写作以及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的历史之作，但是在特殊的时刻和节骨眼上，诗人如果不写诗的话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担当和效力，尤其是严峻时刻对诗人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要求。质言之，无论是日常时期还是非常时刻，“诗与真”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无疑，在今天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谈诗歌之‘真’，肯定不是指本质主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逻各斯‘真理’，亦非反映论意义上的本事的‘真实性’。而是指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之真切，以及强大的语言修辞能力所带来的深度的‘可信感’。”（陈超：《诗与真新论·自序》）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而后者也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他功能，才能使得个人文本与同时代人的其他文本标志化地区别开来。

总会有突如其来猝然降临的严峻时刻，它们可憎、可怕的面目和携带的危害、后果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极限。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就这样来了，给所有人以猝然一击。每一个人都在盯着手机屏幕看肺炎疫情的最新动态，看着地图上颜色的加深，看着那些数字的更新。伴随着疫情的加剧，伴随着疫情和救治的博弈，伴随着恐慌与焦虑，伴随着爱心和援助，伴随着空前增强的民族凝聚力，更多的文学机构、新闻媒体、诗歌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平台，纷纷在第一时间征集“抗疫诗歌”并推出大量的专辑。在封闭、沉闷、压抑的氛围中，“我手写我口”成为很多对生活具备敏感触角的诗人的主动选择，而那些“心急手快”“一吐为快”“不吐不快”的诗人们更是一天数首甚至一天十几首。我身边有很多诗人朋友就在第一时间写了抗疫诗歌——这也是“诗言志”传统的接力，甚至有的诗作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后点击率高达数万。当然，也有的诗人朋友非常谨慎而没有动笔，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写”的理由。在重大社会事件和重大灾难暴发的时候，总是敏感的诗人们第一时间站出来。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经有数万首抗疫诗歌产生，甚至已经有个人抗疫诗集（有的名之为“抗疫纪实诗集”）要在2月份出版，后续的还将有数家出版社推出抗疫诗选，比如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

毋庸置疑，“抗疫诗潮”真真实实地到来了！“写”或“不写”以及“写什么”“如何写”“写出的是不是诗”又成了极其紧迫又焦灼的诗学命题和现实难题，由此我又想到了2008年的“抗震诗潮”。在特殊时期诗人从社会公民和良知道义的角度写诗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这也是诗人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评价诗歌自有其本体的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高达几十万首的“抗震诗歌”能留下来的有几首呢？无论是日常生活流还是巨大事件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奥斯维辛之时还是奥斯维辛之后，任何一个时间都给诗人设置了难题。这一难题或挑战，既是社会学层面的又是诗学层面的。当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公众心理产生巨大波动，当疫情已经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在“规训与惩罚”中，在“抗疫与救助”中，在“真相与舆论”中，人们开始正视生死存亡，每个人都在经受人性和爱心的考验。与此同时，疫情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应急能力和救援能力，确诊的人、疑似的人、死去的人、封闭的人、逃亡的人、惊恐的人、旁观的人、造谣说谎的人、哄抬物价的人、制造恐慌的人、戴口罩的人、逆行的人、援助的人、穿白衣的人、累倒的人、感染的人、牺牲的人，他们实际上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给了每一个人包括写作者重新认识生命、人性、疾病以及医疗、民众、社会和国家的入口。正如当年的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中穷尽了“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各种爱情可能性，正如加缪通过《鼠疫》（1947）揭示了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动机和不可思议的行为一样，“抗疫诗歌”以及“灾难诗歌”同样应该最大化地揭示现实、真实以及人性、疾病的诸多可能。

问题来了，在严峻的异常时刻我们是应该发声还是应该沉默？我们是付诸于行动还是诉诸于笔端？我们是该赞美还是该批判？我们是该说出真话还是用假嗓子表达？我们该讨伐哪一个真正的宿主？我们该将疫情归罪于谁？疫情到来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而又没有看到什么？我们能说出的和不能说出的是什么？这是任何写作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只是一哄而上、简单粗暴地急于表达极其简单和表层化的“常识”，如果只是假大空地毫无生命热力更谈不上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热点写作”“新闻写作”，它们注定是无力的、无效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而从长效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评价来说，“非诗”“伪诗”“劣诗”和“浅薄的诗”“媚俗的诗”“陈词滥调的诗”都是对诗人敲响的警钟。诗人的责任既是语言、修辞层面的又是现实感和社会学层面的，对于任何一个总体性的诗人和具有现实感的诗人来说他们都同时维护了这两个责任和要义，“这首诗里有忧心与恐惧/哀悼与痛哭、行动与献身/更有祈祷和祝福——/东湖之水的碧波荡漾/武汉樱花的如期开放//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但别忘了为它消一消毒/如果此刻母语感染了病毒/一首诗也会呈现新的恶果”。（沈苇：《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在任何情势下写作都是“诗歌之内”与“诗歌之外”同时进行、相互砥砺的过程，只有“现实”而没有“诗”或只有“诗”而没有“现实”，二者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导致褊狭的认知和窄化的表达。

尤其是当愈发复杂的疫情和同样复杂的自媒体舆论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那么多差异巨大的资讯、新闻、故事、心态、眼光以及人生观、现实观和世界观。在此时刻，诗歌必须起到净化和说真话的作用，必须做到正本清源、向善求真，“防疫一天，刚进家门/儿子便丢下玩具，兴高采烈地扑过来/被我一声呵斥住/小家伙愣在那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去洗手间清洗出来/重新抱起他，父子俩啥也没说//隔离汝身，溃烂吾心/爱，也是一种病毒”。（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任何时代的诗人完成的不只是个体写作，更是公民写作。也就是作为写作者来说，这不仅是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而且是诗性正义、语言担当和修辞的求真意志，“诗人尊重语言的民主，并以他们声音的音高或他们题材的普通性来显示他们随时会支持那些怀疑诗歌拥有任何特殊地位的人，事实是，诗歌有其自身的现实，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谢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这包括写作者的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现实和历史是相通的，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现实经验应该能够打通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核。从来都不存在封闭的“纯诗”，当然也不能以“现实主义”来规范所有的诗歌写作者。历史上有很多诗人都认为没有一首诗歌能阻止一辆坦克的前进，因为在现实面前诗人和诗歌往往是虚弱无力、不值一提的。“——这不是诗，因为我没有勇气/冲下楼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因为在死神占据的地盘上/惟有活着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诗”。（张执浩：《这不是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会忘记谢默斯·希尼所说的诗歌又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包括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现实责任。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严峻时刻到来的时候诗人必须是见证者，当然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还不够，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显然，越是在严峻的挑战时刻，诗歌越会被附加各种社会意义和伦理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诗歌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真善美”“微言大义”“社会正义”“时代伦理”等等，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很多诗人那里诗歌首先面对的是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诗歌面向的首先是时间本身，而时间在不同的诗人那里会对应于各自具体的事物或差异性景观，“在这个世界，我卑微，我名不见经传 /像一棵草，低身俯就地/活着，但我也有亲人、恋人和仇人/我也有忧愁、欢乐、悲伤/现在我知道，他们/和它们，是我手上的十根手指/脚上的十根脚趾，没有一根是多余的//还有这个世界的飞鸟、树木、泥土/野兽；这个世界的喧嚣/庞杂、污浊、离乱/这个世界的苍蝇、老鼠、蝙蝠、蚊子、细菌、病毒/它们隐藏着另一个社会，说着另一种语言/身怀另一些我们未知的事实真相/让我们时常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但紧接着又将柳暗花明”。（刘立云：《你，或者我和你》）也就是说诗人应该将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转换为诗歌中的个人时间、容留经验和开放式的“精神现实”，而非对热点事件、新闻话题和现实生活的表层仿写和新闻套写，“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米沃什：《诗的见证》）。这不再只是个体时间，而是整体性的现实时间以及历史时间，由此个人经验上升为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质言之，文学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

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实感受力基础上的“灵魂的激荡”和时间之诗、命运之诗，当然也需要震撼人心的现实之诗、社会之诗。诗歌从时间序列上构成了一个人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评价一个时期的诗歌还必须放置在“当代”和“同时代人”的历史化的认知装置之中。总之，时下正热的“抗疫诗歌”不乏优秀的直抵现实、直击灵魂的作品，也充斥着大量的新闻诗、见闻诗、口号诗和标语诗。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纯粹封闭意义上的“纯诗”和“现实主义的诗”。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性地把杜甫限定在社会学层面的“现实主义”框架内，但我们对“现实”“现实感”“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是历史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杜甫真正开创了诗歌中的现实并且是现实书写的集大成者，所以他的诗歌是“诗史”。当下的疫情和现实已经空前复杂，这对汉语诗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当代诗人“向杜甫学习”“向现实主义传统致敬”不应该成为空谈和口号，应该像当年的杜甫那样真正地理解生活、感受生活以及想象生活、再造生活，通过必要的过滤、提升和转化，在真正意义上把现实转化成历史。这才是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真正动因，而杜甫是我们每个人的“同时代人”，真正的诗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1942年，伟大的哲学家和作家加缪在日记中说：“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2020年，我则记住了居住在云南大理的诗人潘洗尘说的一句话——“要有光”，而文学和诗歌就是这一伟大的发光体！

# 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与当下价值

□刘金祥

哲学范畴的忧患意识是指从客观现实出发对不可知事物将造成的负面影响保持警觉和预判，对将要出现的风险和挑战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做出预备和防范，其实质在于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减少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发生。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难以基业永固，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国家难以社稷长久，可以说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坎坷磨难而形成的精神特质和生存智慧。作为民族精英和国家脊梁，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恪守“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经验教训，宗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准则，居福安之境，虑危殆之险，将备豫不虞深深地植入心灵底层，积淀为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主要表现为对人生状态的深沉反思，对民族命运的深远洞察，对民瘼民疾的深彻忧戚，对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勇敢抗争。

## 忧患意识在历代文人中经久传承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文人介入政治现实、改变国祚苍生的重要精神质素，长久以来深深融注于历代文人精神血液里，逐步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基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处于艰难困厄的危殆时刻，忧患意识就会迅疾释放和强烈迸发出来，成为化解社会危机和破除自然风险的强大精神力量。生活在“天下无道”、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的儒学奠基者孔子，对“礼坏乐崩”的乱世变局有着切入肌肤的危机感，由其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多处记述和论及忧虑、忧患、忧戚、忧愤，特别是“君子忧道不忧贫”一语集中道破了这位儒学先祖的忧患意识，儒家忧患意识的核心就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忧患意识的演进深受历史际遇的影响和驱策，社会环境、政治气候不同，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那里的表现也有所不同。西汉中期以前，国运昌盛，民心安稳，以修齐治平为政治抱负的文人士子开始梳理和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汉高祖时的陆贾，还是汉文帝时的贾谊，抑或汉武帝时的徐乐，都把秦朝速亡的内外因素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思考和剖解，这表明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覆亡、顺治而不忘败乱，不仅是秦汉两朝更迭之际文人士大夫们所发出的深深忧虑，也是他们在太平盛世环境下所承负的政治责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忧患意识在内忧外患频仍、积贫积弱加剧的北宋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曾经开创有宋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所发出的由衷感伤和深沉忧虑，是宋代文人集团的共同感受和普遍识见，这种感伤和忧虑不仅谱写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序曲，而且唱响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为北宋王朝“通变救弊，振兴时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指出：“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明清转换之际，以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为政治信条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篇》中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位被后人誉为清学开山鼻祖的清初三大儒之一，以深挚凝重的忧患意识撰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传世著述，鲜明地表达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主张和“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人文诉求。无论是奠基儒学大厦的孔子和孟子，还是传承践行儒学教义的陆贾和贾谊，抑或赓续儒学思想的欧阳修和顾炎武，这些中国古代的圣哲大儒和杰出文人，社会发展链的中枢，以宏阔高远的擘划力和深邃敏锐的洞察力，钩稽和探赜中国政权演变的历史教训，力求为本朝和后世提供资政镜鉴，所以，忧患意识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必然反应，是张载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理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既是一种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也是一种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愫。历史上很多儒生把兴邦爱国作为政治抱负，将民胞物与作为价值操守，在岁月静好的承平时期历练“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智慧，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信，力图在安危存亡之际构建海晏河清、富足祥和的美好生活。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在忧患思想的熏陶、涵育和启迪下，于《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自强不息、担当道义、匡世救民的永世励志格言，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古代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典范和人格楷模。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不是像西方文人一样以揣测上苍意志为宗旨和归宿的，而是通过完善自身道德理想、展现自身本质力量而顺天应命、除旧布新、爱国兴邦、恤民惠民，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和对百姓生计的忧戚，是传统文人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和重要特点。从春秋战国到清末民初，我国历史上无数爱国文人以浓郁的忧患意识，写下了众多不朽诗词与璀璨文章，屈原、杜甫、张元干、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秋瑾、鲁迅、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梁启超的“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到黄遵宪的“又愁风雨离合，化作他人仙境”，从鲁迅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到巴金的“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可以说以体国忧民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在历代文人中薪火相传、绵延流布，成为传统文人所推崇的思想境界和嘉德懿行。中国传统文人用纸笔状绘民族的艰辛坎坷，用文字述说国家的兴衰浮沉，用笔墨铺陈百姓的劳顿疾苦，用言辞指陈统治者的昏聩颟顸，诗词和文章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与神奇，它以一种别样形式将中国文人内心积郁的忧患意识传递出来传承下去，使时人和后人经常被这种忧患意识所激荡所震撼所触发。

##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精神特质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忧患意识滋养着中国文人的心灵世界，培育了他们的治世精神和从政准则，诠释和言说其中的特殊话语和特定内涵，可以使人们钦慕中国文人忧社稷忧百姓的高超品行。相对于佛与道两种意识形态而言，传统儒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入世”精神，而“入世”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则表现为忧患意识，可以说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重要精神特质，是中国文人固有的思想禀赋。自儒学创始人孔子以来，睽诸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子大都秉持“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忧患意识，将自身的利害、荣辱、功名弃之如草芥尘土，将民族、国家、百姓的前途与命运萦系于心怀，始终对内外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和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保持一种敏感、警觉和防范，力求为国家兴盛和苍生福祉贡献心智奉献生命。儒家这种“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促使中国历代文人在朝堂之上敢于向君王直言极谏，另一方面驱动他们赶赴边关整修武备，化解潜在危机，竭力刈除不测祸端。由此，笔者认为儒家所奉行的忧患意识，可谓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一种思维和批判精神，正是有了这种思维和批判精神，一些文人士大夫才能够坚决抵制和抨击封建体制中那些不顾社稷不恤黎民的奸佞、邪恶和异端，才能够以犀利观点和恳切言辞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改革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在中国传统文人那里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些文人士子由于受历史之羁绊和体制之框囿，只能通过“以身报国”“杀身成仁”“舍身求法”“舍生取义”来体现忧患意识，实现内在超越和自我提升。儒家的忧患意识虽然对皇权专制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和批判功效，但它毕竟与现代知识分子秉持的批判意识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产生在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环境里，建立在现代法治文明基础之上的。一般而言，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不是对某个社会个体进行批驳和否定，而是依照理性原则和法治观念对某种体制缺陷予以整体性甄别、检视和改进。今天，我们不应苛求那些抱有善良动机和理想良知的传统文人，因为他们的主观愿望只有也只能在打破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 新时代中国文人应弘扬光大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智慧，居安思危是历史昭示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华民族备罹挫折磨难依然成长壮大，中华文明饱受外界挑战依旧勃发劲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历代文人始终褒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心理和风险观念，始终安不忘危、居安思危。近代以来，面对国运存亡绝续、民族危在旦夕的严重社会动荡和巨大民族危机，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空前觉醒，以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感时愤世、忧国忧民，事不避难、责在人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忧患意识和危机观念为驱动，以自强不息、利国兴邦为使命，坚韧决绝，刚毅血性，奉献才华与智慧，挥洒青春与热血，成为叱咤于近现代社会的风云人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知识分子心怀祖国、情系人民、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发挥开拓者、先行者、倡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引领和带动人民群众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发展动能严重不足，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包括重大传染性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滋生蔓延，这表明前进道路不可能总是艳阳高悬、风和日丽，越是在成就辉煌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越要全面提升对社会动荡和自然危机的预判力和掌控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基于深沉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求“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面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事件在内的突如其来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当代知识分子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危机观念，努力消除贪图享受、消极懈怠、高枕无忧的“鸵鸟心态”，坚决摒弃草木皆兵、庸人自扰的陈腐思维，彻底摆脱思维萎缩、精神懈怠、意志消沉的麻木状态，切实做到忧患如磐、重任在肩、励精图治、奋发进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继续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华彩篇章。忧患意识，其表在担忧，其里在担当，其源在情怀。当前，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医务工作者要站在为民解难的高度，发扬大爱无疆的精神，主动请缨、勇担重责，不顾安危、不辞劳苦、不吝才华、不辱使命，积极参与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特大战役，深入防治救助第一线，充分发挥专业优长，无私贡献知识技能，为尽快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奉献当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力量，使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焕发出穿越时空的魅力和生命力。